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 城市军事管制制度

■王 飞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许多大中城市。为了把国民党长期作为统治据点的城市改造为人民的城市,城市管理就成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中的一个新问题。中共中央总结了各地接管城市的经验,决定在解放之初,城市管理一律采用军事管制制度,以便迅速肃清残余反动势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实行军事管制的城市,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那么,军管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机构,军管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一)

1949年,我军相继解放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西安、

广州、重庆、兰州等100余座大中城市和1000余座县城。这些城市大多是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由于国民党大溃败时的破坏,各大中城市疮痍满目,问题堆积如山。如:上海解放前夕,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工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入半瘫痪状态。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煤只能烧7天。国民党官兵留散在上海近2万人,国民党还留下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此外有一批惯匪、流氓作乱,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计达60万人,上海的社会秩序很不安

定。

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趁新解放城市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大肆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西安市刚解放时,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纠集11个师的兵力,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市反扑。头5天内,发生了170多起抢劫事件。刚解放的广州市,两个月中发生了831起抢劫案。重庆市刚解放的头1个月中发生各种案件228起。潜伏的特务、反动分子勾结惯匪进行猖狂的破坏活动;有的公开持枪进行抢劫,组织暴乱;有的贴布告,自立番号,企图收编残兵败将;有的骚扰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阻止接管城市工作;有的袭击、抓捕或杀害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有的破坏城市交通,抢劫解放军枪支、粮食物

第七次大裁军。为适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军队精简整编的需要,国务院、中央军委于同年8月作出了《关于撤销建设工程兵的决定》。建设工程兵大部按系统对口集体转业到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水文地质部队转隶有关军区;战备通信部队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水电、交通、黄金地质部队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3年11月,建设工程兵

领导机构被撤销。至此,作为一个兵种的建设工程兵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除了上述撤销的军兵种外,被撤销的兵种还有骑兵,另外还有司号兵、探照兵、对空情报兵等兵种专业被撤销。其中,骑兵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一个兵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组建起来。在解放战争时期,骑兵部队最多发展到10余个骑兵师,这也是

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还组建过专门的骑兵学校。1985年,中国进行百万大裁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摩托化和机械化取代了骡马化。至此,骑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已不复存在,全军仅象征性地保留了几个骑兵营、连,目的是为了展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的骑兵风貌,让中外人民了解、目睹现代条件下的这一古老的兵种,另外,还担负着中国影视片的拍摄任务。

资;有的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据统计,1950年新解放区有4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残杀),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有的纵火、爆炸、投毒、割电线、打哨兵;有的伪装军管人员,打出各种旗号,接管财物,制造混乱。散兵游勇、流氓盗匪流窜街头巷尾,趁机行凶作恶,破坏社会秩序,损坏公共物资,盗窃国家财产。一些奸商、金融投机分子,囤积物资,进行金融投机活动,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台湾国民党军飞机还对沿海城市的重要设施进行狂轰滥炸,一些城市遭到破坏和人员伤亡。如:1949年1月9日国民党飞机轰炸济南市,炸死炸伤市民140多人。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军飞机分4批轰炸上海,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千百间民房被毁,500多名居民被炸死。由于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一些城市时常出现停水、停电、停工、停课、交通中断、供应困难等混乱局面,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二)

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如何接收和管理新解放的城市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今后“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在新的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之际,如何避免混乱,稳定城市秩序,平稳地完成由旧政权向新政

权的过渡,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大难关。对于军队来说,如何接收城市还是一个新课题。

中共中央对工作重心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战略转变十分重视。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6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在过去收复的城市工作中,曾发生过违犯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现象,为了把城市接管好,发出《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必须由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担任该城的军事管理,所有入城工作的地方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一律听其指挥。为此,可以组织军事管理委员会,吸收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将保护新占领城市的全部责任,交由军事管理机关担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一经验,当即转发各地遵照执行。从此,在各新解放城市,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制度。

1948年11月2日,在辽沈战役的硝烟中,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东北重镇沈阳。在辽沈战役即将胜利的时刻,党中央已把接管沈阳的准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后,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了准备接收沈阳的任务。东北局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紧急筹划接管沈阳的各项准备工作。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成立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东北局副书记陈云任主任,伍修权 and 陶铸任副主任,全权

处理接管沈阳的工作。10月28日,军管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在会上陈云确定了接收原则,并提出军管会的“约法八章”布告、卫戍司令部的入城布告和市长就职布告要多印多发的要求,一进城就由电台向全市人民广播,并告诫接管人员:沈阳的解放为全国所瞩目,应当兢兢业业,犹如“进京赴考”。

1948年11月2日黄昏,陈云带领军管会主要干部和卫戍部队进入沈阳。11月3日,东北局在大和旅馆召开了成立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会。陈云在会上特别强调:沈阳是我党接收的第一个大城市,一定要接管好,不能将我们打下来的城市变成死城市。要让国民党所有在职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人民政府报到,一律上班,各机关开始办公,工厂开始生产,商业部门都要开始正常营业。从现在起,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了,我们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更好!会上还宣布成立沈阳特别市政府,朱其文任市长,焦若愚任副市长,并任命了各局负责人。会后,军管会按照陈云提出的“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方针,开始了全面完整的接管工作。

军管会下辖9个部门,分别接收原国民党机构的各系统。在接管过程中,军管会发出布告,通知原国民党机关主管人员负责办理移交手续,要求旧职人员均按原职上班,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各接收部门对工厂、企业和房子等只有接收权,而无占有权和支配权,权力集中在军管会,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这一切都

是为了避免社会动乱,尽快恢复企业生产,使城市经济生活迅速走上正轨。

在陈云主持下,接管工作井然有序,进展迅速。陈云的办公室设在中山广场宾馆会客室里,他处理问题速度惊人。时任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第六处政委的曹慕尧回忆说:“我进门的时候,看到坐在人群中间的陈云,态度十分严肃,每句话都非常简要,铿锵有力,像快刀斩乱麻一样,回答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接见每个人的时候,他先问,什么事?请用三两句话说明事由!然后限定汇报者在几分钟以内讲完,一定要说清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还必须先提出个人对问题的处理意见。”著名作家、随军记者刘白羽是沈阳军管会对外报道委员会成员之一。据他回忆:“陈云同志每天晚上开一次会,去接收各方面的人都来汇报接收的进展和情况,他让我也参加,大家汇报完之后,他就指示第二天怎么办。我的任务就是到街上去走,然后每天晚上向他汇报有几家商店开门了。开始没有,不敢,怕。后来我就一点一点地向他汇报,我说开了一个了,开了两个了……后来大概开到十几个吧,陈云同志手一拍,‘沈阳,平安解决了’。”

1948年11月6日,沈阳持续三天的封城和夜间戒严结束了。人们的生活开始恢复正常。全城的电灯和电话在11月3日下午已经修复了,几天后自来水的问题也解决了。邮电11月5日在全东北开通,11月6日电车恢复运行。到1949年1月,沈阳的接管工作顺利完成。由于陈云领导有方,指挥得当,方针

正确,措施有力,接管工作进展顺利,快速稳妥,使沈阳这座饱受创伤的历史名城得以很快复苏,运转自如。

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东北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接管好沈阳的工作,对建设东北和支援全国都有重要意义。能否将这样一座大城市接管好,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陈云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一举打胜接管沈阳的战役,为日后我党接管大城市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榜样。

陈云经常提醒军管会的同志,要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总结经验,为全国提供借鉴。11月26日,军管会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接收沈阳的经验。11月28日,陈云写了《接收沈阳的经验》一文,上报东北局并转报中共中央。后由中央作为成功的经验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

(三)

关于如何实施军管,中共中央已于1948年11月15日发出的《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中作了明确规定。解放军总部也先后颁发了《关于解放区军事管制条例》和《关于新解放城市军事管制时期的各项政策》等文件。根据上述文件规定,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一律成立有党、政、军负责人及各界人士参加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军事管制的领导机构,也是城市在解放初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当地驻军最高首长担任主任。北平、天津、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解放后都相继成立了

军管会,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粟裕、黄克诚等军队高级将领都曾担任过大城市的军管会主任。对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中央作了明确规定:“一、镇压反革命分子之活动,并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和扰乱社会秩序的散兵游勇,以及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逮捕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军火武器及其他违禁品,解散国民党、三青团及蒋介石集团系统下之其他一切反动党派、团体和特务组织。二、接受并管理一切公共机关、公共产业、公共物资及其他一切公共财产,并没收应该没收的官僚资本。三、保障一切中国人民及守法的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工农商学各界一切正当的权利,迅速恢复市政建设事业,恢复与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四、动员一切公私力量沟通与建立城乡经济的正常关系,特别是指导与组织公私各种力量,解决城市人民的粮食及燃料的供应。五、发动与组织革命群众团体,帮助建立系统的人民民主政权机关。六、为执行军事管制任务之必要,得发布戒严令,并依据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之政纲,发布临时法令。”军管会完成这些任务之后,经上级批准,即将一切行政权力移交给市人民政府和警备司令部,并被撤销。

中共中央在1948年底转发的《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草案》中明确提出:对新收复的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或工业区,均应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应指定攻城

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军政负责同志与地方党政若干负责人,组织该城市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军管会为该城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及党政军民机关与各接管工作人员均须接受军管会的统一指挥。根据工作需要,军管会下设若干机构。采取的组织形式和步骤是:解放一个城市就接管一个城市;中央直辖市和重要的大城市的军管会领导人由中央和军委直接任命;省会城市及腹心地区和交通干线上的重要城市,都由所在各省、专区的兵团、军负责接管;其他中、小城市,则由驻该地区的师、团进行接管;各省会、专区均成立军管会,由所在的兵团、军的主要领导,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城市接管工作均由军管会负责组织实施。

入城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特别是大城市的接管必须做好适当准备,才能进城。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总是善于统筹兼顾。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刚刚响起,毛泽东就开始部署接管北平问题。1948年12月12日,叶剑英奉命来到西柏坡,毛泽东亲自同他和彭真等人谈话。毛泽东告诫他们:“这次接管北平,影响到中外,你们务必要达到像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特别要注意防止出现一些‘左’的做法。”他一再嘱咐说:“接管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都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地接下来,慢慢处理,人多了不要紧,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嘛!”

在上海,渡江战役总前委对进城也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1949年4月30日,邓小平、陈毅等向中央

军委报告:“我党军队未作适当准备草率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中共中央还确定了“慎重、缓进”的方针,为接收上海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说:“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1949年5月26日晚,上海即将全部解放之时,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大批接管干部离开丹阳向上海市开进,顺利进入上海市。

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份重要文件成了新国家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军事管制时间的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各地的军事政治情况而定。从此,军事管制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四)

军管会是城市实现新旧政权顺利过渡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机构,在城市解放之初的一段时间里,直接担负起接收和管理城市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后,军队对中央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接管的同

时,还抽出了一部分部队到各省,加强对中、小城市的接收管理工作。军管会所担负的基本任务和发挥的主要作用有:

一、解散反动政权组织,肃清匪特,清除散兵游勇,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新中国建立前后,由于国民党的统治体系已经崩溃,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城市秩序十分混乱。军管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一是解散反动政权机构和党团组织。各地军管会入城后,立即开始摧毁一切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机构和反动党团组织,从重从快打击反革命活动的坏分子。军管会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了管制,并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汉奸、特务、国民党官僚,各地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被肃清,初步安定了社会秩序。二是肃特肃匪,收容散兵游勇,维护社会治安。到1950年底,大陆上成股的土匪已经基本被消灭,潜伏的特务也大多肃清,共剿灭匪特武装100多万人,社会秩序逐步趋于安定。各地军管会肃特肃匪、收容散兵游勇,打击流氓无赖、反动会道门,极大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二、没收官僚资本,打击投机资本,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

新解放的城市,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各地军管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稳定了社会秩序之后,立即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恢复社会经济工作上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是没收官僚资本。军管会入城之初,即将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

企业一律予以没收,归人民政府所有。到1949年底,全国共没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以及国民党政府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二是打击投机资本家的不法活动,稳定市场秩序。新中国建立初期,通货膨胀严重,投机资本也乘机兴风作浪,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的稳定。为稳定市场秩序,各地军管会运用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同投机资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各地军管会采取措施,首先严厉打击金银外币的买卖投机活动,国家银行基本控制了金融市场,人民币开始占领了流通领域。投机势力在金融投机中碰壁后,又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哄抬价格,扰乱市场。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当1949年11月25日物价大涨时,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收紧银根,使投机商资金周转不灵,纷纷破产,制服了投机资本家。三是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这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总方针。恢复生产是管好城市、稳定局面的关键。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沟通城乡联系,促进经济建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各城市军管会和各地驻军抽调施工力量,努力恢复交通,保障运输。安定人民生活是城市稳定的关键,衣食住行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摧毁国民党旧政权的同时,各地军管会十分注意恢复城市功能,关心衣食住行,安定人民生活,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

品,如粮食、燃料、肉类、蔬菜、原料等的供应。

三、帮助建立各地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使革命政权在全国得以迅速建立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各地军管会在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党团机关之后,迅速着手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城市解放后,首先建立市人民政府,再建立市以下各级人民政权机关。军管之初,市人民政府即宣告成立。市长由上级机关任命或军管会任命。市政府内部一般设秘书、行政、人事、外事、侨务等处。下属公安、法院、财政、民政、工商、教育、卫生、公用、工务等局。在市人民政府下,一般设区人民政府和街公所两级。城市各级人民政权机构,是巩固革命成果的根本保证。与此同时,组织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基础。在城市,尤其是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由于情况比较复杂,人民代表会很难以立即召开。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旦条件成熟,它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市人民政府。到1951年3月,全国已解放的28个省有23个已召开过人民代表会议。1951年4月,政务院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凡尚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四、接管新闻出版教育事业,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

各地军管会在接管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的教育、文艺和新

闻出版等事业的同时,根据毛泽东“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的指示精神,对旧教育和旧文化事业进行了利用和改造,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体系。各地军管会对新闻出版业进行了整顿与改造,并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和图书馆,新华书店同人民邮政、人民银行等成了新接管城市的象征。对于学校,各地军管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各级公立学校,采取了“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办法。又于1950年12月,接管了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21所,中等学校514所,初等学校约1500所,收回了中国的教育主权。1952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逐步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人民政府接管,改为公立。

新中国建立前后实行的军事管制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实行的一种政权制度,它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和新的文化体系,支援前线作战,顺利地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建立全国政权,有重要意义。

(五)

北平是新中国的首都,接管工作十分重要。在彭真、叶剑英的领导下,北平接管工作有条不紊,社会稳定,生产恢复,有力地回击了当时国内外反动派所谓“共产党不能管好城市”的谣言,同时也为中共中央、毛泽东顺利进入北平打下了基础。

1948年12月13日,党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第一副书记兼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及市长。1948年11月下旬,接管北平的干部从各解放区汇集到河北保定。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保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对于那些第一次进城的干部,叶剑英耐心地教他们怎样使用电灯开关,怎样使用抽水马桶等等。彭真告诫大家:进城以后,不许学李自成,不准抢房子,不准抢沙发,谁违犯纪律,谁就要受到严厉的处分!

随后,叶剑英和彭真率领接管人员先后抵达北平西南的良乡,利用解放军和傅作义谈判的这段时间,抓紧教育训练接管干部,明确任务和组织纪律。12月21日,中共北平市委发出《关于如何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为了做好接管工作,叶剑英于12月24日在接管北平的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接管的原则,是有系统的完整的接管。不打乱原有的系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权机构外,其他的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均由原系统实行接管。原有单位的一切工作人员都照旧供职。

1949年1月21日,解放军与傅作义集团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由中共和傅方人员参加,负责进行北平接管工作。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威武雄壮的北平入城仪式。2月4日,北平市人民政府接管旧北平市政府的仪式在原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会议厅举行。原北平市长刘瑶章将原北平市政府大印交给了叶剑英,并表示旧

北平市政府所有官员、职员听候人民政府处理。叶剑英作为北平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代表人民接掌了北平市政权。

解放军开进北平后,彭真、叶剑英等人立即着手进行全市的接管工作。军管会首先接管了旧北平市政府机构。接着,对上千个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接管。叶剑英每天都要听取接管委员会负责人戎子和、钱俊瑞的汇报,了解接管工作情况,及时给予指示。他十分重视接管中的政策问题。一次,物资接管委员会财政部未经请示,接管了存放于荷兰领事馆的联合国经合总署援助的面粉,引起了涉外事件,叶剑英对有关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要求所有接管人员从中吸取教训。同时,又以军管会主任的名义,义正词严地反驳了经合总署代表的借故攻击,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件。

在市委和军管会的领导下,军管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就把主要的政府机构、厂矿企业、文教卫生等单位接收过来。在接管政权机构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旧人员的接管与处理,北平市仅市级机关就有人员5121人,加上司法和公安人员就更多了。军管会组织这些人进行学习和改造,并对他们作了妥善处理与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继续为人民服务。

要使民心向党,安居乐业,还需要进一步整顿治安、建立革命秩序。北平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解放后,潜留了大批特务,散兵游勇、土匪小偷、银元贩子也到处为非

作歹。为了加强治安力量,市军管会组织了北平纠察总队,主要任务是执行纠察,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针对社会上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的“五多”情况,叶剑英提出要迅速消灭混乱现象。1949年3月下旬,在市委和市军管会的领导下,平津卫戍司令部、北平纠察总队、市公安局等部门领导同志组成了北平市治安委员会,叶剑英任委员会主任。由于措施有力,坚决打击和肃清了暗藏的敌特,捕捉了劫盗匪徒,处理了散兵游勇。到1949年秋,仅用半年时间,就破获潜藏特务匪徒策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83起,总共肃清职业特务6700余名,查处散兵游勇3.7万多名,破获制造伪钞、盗窃、抢劫案件1.4万多件,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和炸药,初步解决了治安问题。

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影响到人心的向背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威望。在市委的领导下,叶剑英带领军管会 and 市政府的同志们,一开始就高度注意安定全市200多万人民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解决粮、煤、水、电的供应和统一货币。他们通过军管会有关部门,从其他地区调运和储备大批粮食、煤炭及油盐等物资,迅速恢复了电力和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将必需的生活资料供应给市民。

统一货币制度、抑制通货膨胀,是北平市军管会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并决定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发行的金圆券,随着政权的崩溃而不

断贬值。市场上以银元计价、流通或以面粉、大米等实物计价,已成为普遍现象。银元黑市十分猖獗,带动物价不断上涨。为保障人民利益,安定金融,稳定物价,北平市军管会于1949年2月2日至3月9日连续发出3个布告,收回金圆券,发行人民币。与此同时,开展打击和取缔金银黑市活动的工作。由于北平解放前,在城外解放区准备好了大批人民生活必需品,解放后立即源源不断运进市内,广大群众可以用人民币按国家牌价买到急需的东西,一举树立了人民币的权威;同时又统一了货币制度,抑制了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群众生活得以安定,这样就为顺利推行党的各项城市政策,恢复和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恢复金融秩序的同时,市委和市军管会把市政工作的中心放到了发展生产上来,把消费的城市改变为生产的城市。彭真和叶剑英多次召集国营企业、私营企业的代表及有关人员开座谈会,向他们调查了解生产中的情况,讲中共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对国营与私营企业发展生产分别提出不同要求。经过反复动员,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私营企业的资方逐步了解了党的政策,安定了情绪,也表示愿意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

在此基础上,市委和市军管会逐步对国营企业实行民主改革,对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实行调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他们还采取由政府 and 银行投资、贷款等方法,帮助公私营企业解决资金、原料来源和产

品销路等问题,使这些企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北平市生产的工作中,市委和市军管会抓住了沟通城乡贸易这一环节。市政府成立了城乡贸易指导委员会,积极发展同许多地区的贸易关系。1949年6月,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举办了工业展览会,请华北各地和其他解放区派代表团来北平参观,交换各地区的生产经验,了解各个地区对北平市工业产品需求的情形。在工业展览会期间,北平市与各地成交了大批货物,开始建立了与各地交换物资的关系,扩大了北平市工业生产的原料来源和产品的销售市场。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北平市的生产达到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中国共产党人用事实有力地回击了当时国内外反动派所谓“共产党管不好城市”的攻击,为以后接管城市提供了经验。

由于彭真、叶剑英等人认真贯彻了党中央的指示,在入城前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因而不仅圆满地完成了接管任务,使北平古城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而且创造了接管大城市的经验,也为新中国在北平定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平接收工作的成效,赢得了中外舆论的赞扬。当时国统区出版的《新闻天地》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叶剑英领导的中共干部,为了打稳中共未来首都的基础,接管是审慎、周到、仔细、严密的”,“几乎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这是对北平接收工作的一种客观而又公正的评价。

由于城市解放时间的不同和

具体情况的差异,结束军事管制的时间也不一样。东北地区解放较早,在新中国成立时,大部分城市已结束军管,选举产生了地方人民政府。其他解放较晚的地区,结束军管的时间也较晚。1952年底,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大多数人民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已比较健全。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确定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机构建立后,城市军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遂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事管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形式,是用军事手段强行接管旧政权的一切组织和权力,防止、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破坏,减少或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损失,保证了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从而得以顺利地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它对于胜利实现从旧政权到新政权的过渡,迅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各项社会制度改革的胜利展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的军事管制,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军执行的特殊使命,它实际上已成为我军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军管的时间不长,但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我军历史上记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永志史册。